

游山西·读历史

游学

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
连通与拱卫的中枢(一)

杜学文

山西的自然地理文化条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开而不放,封而不闭。华夏文明之所以在山西晋南及关中、豫西一代的中原核心地带形成,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有极大的关系。就山西地区而言,在中华地域的广阔范围内,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一是其地域的独立性。这使其与外部的联系受到相应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此也显现出其地域的另一特点,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这里仍然保持了与外界的连接,能够通达更多样的地域。

从这一层面来看,山西地区就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其东西之太行山、吕梁山成为天然的屏障,黄河沿其西部向南再折向东流入大海,形成环护。加以南部的中条山、王屋山与北部的阴山余脉成四合状,使山西成为一个被围拢的区域。同时,在这些天然的屏障之间仍然存在某些可供通行的孔道。特别是在阴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之间,有可进入蒙古高原的路线。这一点极为重要。它使山西地区能够与草原连通,并由草原进入西域。而在山西东南部,又有许多地方可穿越太行山与中条山,跨越黄河,进入关中与豫西之平原地带。

在车成为运输工具之前,山西已经是连通西域的重要通道,研究者把这一连通西域的路线名之为“山西道”。山西道早期主要是水运,沿黄河南下进入中原。《史记》的《夏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载,说“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梁,西戎即序。”司马迁在记录大禹治水,平雍州时划定了雍州之大致范围,确定了这一带的贡赋。雍州一带的贡物要从积石这个地方经水运至龙门,也就是黄河两岸之西河之地,大约在今天的河津一带,然后要集中在渭水的拐弯之处,再送往都城,应该是今临汾陶寺一带。商时,作为运输工具的车已经广泛使用,至周,不仅运输工具得到了极大的改进,道路系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用造父所驾八骏之车西巡的过程,他从平周洛阳翻越太行山,沿太行山沿线至雁门关,然后进入黄河河曲地带,又沿黄河进入西域地区,其返回的路线亦大致如此。而在西周都城镐京,即宗周与成周洛阳之间筑有“周道”,以保证两地之通行无阻,其中可沿渭水东去,过桃林塞,北上进入汾河,或过蒲津渡在今永济北上,沿汾河往太原,再往燕蓟之地。由此看来,山西既具有通达草原地区的出口,亦具有通达豫北之道路,能够连通草原与中原。同时,山西也是从关中往燕蓟一带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可能不同的情况下所行路线并不一致,但却成为由西往东的重要路线。尤其在北京成为都城之后,其

东西向的道路更为重要。有研究者根据考古发现梳理了粟特人从西域进入中原再往东行的路线,发现山西正是这一由西往东道路的关键路段。明清时期,朝贡体系进一步完备。西域各国朝贡的目的地为京城北京,他们需经山西出太行山到达。而在山西的考古发现中,有大量西域人活动的遗存,正是这一历史的证明,说明山西正好处于一个南北连通中原与草原,东西连通西域与燕蓟,再往东达辽吉之地的十字路口,是具有中枢意义的地带。这种交通方面的重要性一直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至现代交通的兴起才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当然,并不是说连通中原与西域地区仅此一路。所谓丝绸之路并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从西域至中原不可能仅经山西。无可否认的是,山西地区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汉时,武帝发兵进击匈奴,多从山西出兵,乃为其有通道可达。而匈奴也往往经山西袭扰中原,亦因有交通之便。唐时,中原与突厥、回鹘之冲突、联系亦多经山西,史籍中记载回鹘往长安,要经太原,再南行。而中原往回鹘亦如此。以至于太原成为回鹘信仰之宗教摩尼教的中心地区。其原因就是因为太原为中原与回鹘交通的重要枢纽。这里聚集的回鹘人口比较多,往来商人、使节、军旅极为频繁。明清时期,山西是中原地区与蒙古北元交战、贸易的重要孔道。发生了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除与草原族群之间的战争外,山西是商贸交通的重地。汉唐时期,西域粟特人为最活跃的丝路商人,在山西就发现了大量的显现出粟特文化特点的遗存。当时的蒲州今永济,介州今介休,并州今太原,代州今晋北,以及平城今大同沿线是往来商旅,特别是西域人士最活跃的地区。明清时期,适应守护北边之需,明政府在沿长城沿线建九边重镇,屯军戍守,晋地商人展开戍边贸易,以供军需,亦由此晋商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兴于盐,盛于茶,辉煌于票号,纵横九万里,驰骋六百年,建立了从福建武夷山地区,以及后来的湖南湖北地区至亚洲腹地恰克图的贸易路线。这一路线从福建武夷山开始,经安徽、河南,再沿山西汾河河谷或太行山一线进入蒙古高原,再进入俄罗斯地区在恰克图汇集,经俄罗斯商人做转口贸易进入欧洲更为广大的地区。晋商不仅在晋地的生意红红火火,其足迹亦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以至于东南亚地区,以及俄罗斯与欧洲,成为真正的国际贸易,显现出全球化的强劲态势。而山西,不仅是晋地之商人行踪遍及各地,更重要的是,作为连通中原与草原,进一步连通江南与极北之欧亚地区的中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生活的“七字经”,向来就是老百姓们常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而这七字经把酒排除在外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有那么点遗憾。我个人以为,既然把可饮也可以不去饮的茶都放在了里边,那么酒也是可以放进去的,因为许多人的生活根本就离不开酒。

常听人们说“无酒不欢”,而向来却没听过有人说“无茶不欢”,这个“欢”字原是让人喜欢的,而茶跟欢字似乎怎么也纠缠不到一起。但酒就不一样,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一旦有了酒——当然是白酒,那么气氛便会马上欢快起来。喝酒,或喝什么酒,当然是全看个人的喜好,鄙人从小习惯了俗名叫做“烧刀子”的白酒,而既叫“烧刀子”,其度数一般都不会低于60度。朋友聚会,吃什么菜向来是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首先要问一下喝什么酒,高度还是低度?

喝酒而问高度低度也只是现在的事,上世纪80年代之前,市面上可以说就没有低于60度的白酒。各种酒坊,虽然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大家都遵守着古制,酒不到60度就不会出厂,所以也就没有高度低度一说。当然这只是说白酒,其它酒往往不以酒的度数论,比如大家坐在那里喝葡萄酒,就从来没听人们说要喝多少度的葡萄酒,当然葡萄酒也是有度数的。也没听有人在喝黄酒的时候会问要喝多少度?绍兴酒也是一样。而喝白酒,是要看度数的。在日本,喝茶有“茶道”,插花亦有“花道”,而却没听过喝酒有“酒道”。但在中国的民间,喝酒的讲究鄙人认为要远远大于喝茶,而且是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比如朋友们聚在一起,先喝几杯,然后再怎么喝。好像是,在这方面,山东的规矩要大于其它地方,没酒量的人尽量别往山东的酒席上蹭,河南酒席上的规矩也挺怕人的,酒量小的要先给自己拿好主意。山西喝酒的规矩简单一点,是大家共同先来三杯,然后各自随便,酒量好的可以打个通关,一桌人每人敬一杯,这就叫做打通关。没酒量的可以坐在那里不去打这个通关而只顾吃菜也可以。



黑米白酒

王祥夫

张朝曦 图

说到白酒的高度和低度,在中国的民间,酿酒大多用高粱。所以,在北方,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高度数的高粱白,河北和山东多用薯干酿酒,这种酒在民间就直接被叫做“薯干酒”,度数亦是不低,虽然其不好与高粱酒相比。为了酿酒而广种高粱在国内的几大酒厂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北方乡下的诸多酒坊酿酒也多用高粱,这是白酒。而过年过节之前人们还要酿的那几坛酒往往却是用黄米——也就是黍米所酿的黄酒,人们把做这种酒的方法叫做“捂酒”,也就是直接把酒坛放在尚有余温的草木灰中捂着。客人来了,无论是男客或是女客都可以喝那么一喝的就是这种酒,也就是黄酒,鄙人不怎么喜欢北方民间的这种黄酒的道理就在于它太甜,它的甜与它的酿酒材料有关。所以真正喝酒的人除了酒的度数之外还是要看它是用什么来酿造的。一般的说来,高粱大麦乃至干豌豆,都是被广泛用来酿酒的,鄙人喝酒,是看到了酒瓶上的“高粱”二字便会兴奋,而在山西,其实更加珍贵的一种酒不见得许多人都喝过,那就是黑米白酒。黑米白酒是用黑小米酿造,乡下的老丈人招待新女婿必用的便是黑米白酒,年节招待贵客也必用黑米白酒,如果恰好有这种珍贵的酒的话,我的酒友里边喝过黑米白酒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酒的珍贵即在于它的少,在于它在市面上通常的不易见到。黑小米的产地大多分布在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但很难说哪个地方的黑小米更好,乡间的老百姓把它又叫做月子米、补血米、药米,据说是因为它含有的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维生素非常丰富。就民间的说法而言,一般黑色的东西像是都比较补,南方的黑色大米要比白色大米贵的道理也在这里。而用黑小米酿造的白酒当然要在白酒里拔头筹的道理即在于——怎么说呢,黑米白酒是醇厚和猛烈的合体。对于没有喝过这种用黑米酿造的白酒的朋友我也只能这样介绍一下,是既醇厚又猛烈。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也很有意思,醇厚而猛烈,鄙人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好白酒应该拥有的品格。

再说到喝酒,鄙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喝来喝去,而想不到想向朋友们介绍的却是这种很少能在市面上见到的黑米白酒。就像台静农老先生去了台湾大学之后再三说到青岛的“苦老酒”,我几次去青岛,终于还是没有喝到。

人物

自从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以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被别人拥抱过了。

兄弟俩进入儿童之家的时候,也许是对父母还有着很深的思念,对张桂梅还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把儿童之家也只是当作栖身的地方。张惠华对张桂梅还有点怕,大家都叫她妈妈,他却有点叫不出口。在他的眼里,张桂梅对大家是比较严格的,张惠华便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有意识地躲着她。孩子们在打扫卫生,张惠华打扫完自己的区域,便坐在大厅门口睡着了。等到张桂梅从外面回来,看到张惠华在那里睡觉,误以为他在偷懒,就把他叫醒了,批评了他。这时候,张惠华心里觉得很委屈,觉得

这个妈妈有些不讲道理,不像一个妈妈。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张惠华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这一年的中秋节,张桂梅忙着学校和儿童之家的事,竟把这个节日给忘记了。儿童之家有几个调皮的孩子悄悄地把县法院的铁栅栏掰下来,当成废品卖了。很快,法院的人便找上门来,跟张桂梅理论。得知孩子们闯了大祸,张桂梅非常生气,赶紧给法院的人赔礼道歉。好不容易把人送走,张桂梅转身就开始“查案”,很快便查出五六个参与这件事的孩子。她把他们都叫到跟前,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最后,张桂梅追问掰下来的铁栅栏卖到哪里去了。孩子们坦白:“当废品卖了,买月饼吃了。”

希望出版社

57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这时候,张桂梅马上明白过来,她忘记什么了。望着一群垂头丧气的孩子,张桂梅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孩子们啊,是我不好,忘记给你们买月饼了,但是你们乱拿别人的东西是不行的,以后一定不能再这么做了。”下午放学回家,张惠华惊奇地发现,儿童之家食堂桌子上摆满了月饼和水果。

连载

山西教育出版社

57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与彭德怀同住的除了夫人浦安修,还有一个孩子,只有五六岁,是烈士遗孤。紧邻耳房两间较宽敞,警卫班在此值守。随行人员住正房,秘书一姓李、一姓张,医生姓刘,伙夫姓王,此房同时兼做厨房,东房则由主家居住。西院为马厩,马夫住在此。向西还有一院,为洪赵支队驻地指挥

部,院子里长着一棵山楂树,枝叶茂盛,高过屋顶,树冠遮去大半个院落,果实红得透亮,似在怀想那段红色岁月。那是1941年春天,“百团大战”结束不久,彭德怀率部撤至绵上北部,以胡汉坪为中心,西至窰壁、松罗店、马背,东至胡家庄、善朴、段家坡底和赤石桥,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休整。而在此前半年,“百团大战”收官之战也发生在这里。

当地老人对那场战役记忆犹新,他们习惯称之为“胡汉坪刺刀战”。战役主官叫胡兆祺,沁源城关(今沁河镇)北村人。1921年7月,胡兆祺考入山西陆军学兵团第三期学习,1925年毕业,历任山西陵川、榆次保卫团教官,晋军排长、连长,晋绥军第1纵队4团少校

营长、团部中校副官。1931年,胡兆祺弃军回乡,成立“红色同志会”,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胡兆祺历任中共沁源县特委军事委员、沁源县特委代理书记、沁源县委特派员。1934年2月,胡兆祺再入晋绥军,1935年2月被叛徒出卖,关押两年。1937年5月,胡兆祺出狱,恢复组织关系,任山西军训委员会军训干事。全面抗战时期,胡兆祺回乡组建了5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1937年9月编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历任第1总队2大队5中队中队长、3大队9中队中队长,第1纵队第1总队3大队12中队中队长、1大队大队长,第1总队参谋长,第1纵队第38团参谋长。

纪实